

上 编

第一章 孟子生平事迹

孟子名轲 出生在邹国(今山东邹县)邹国是与鲁国毗邻的小诸侯国。赵岐《孟子题辞》说：“或曰 孟子 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 丧母而归葬于鲁也。”据此 则孟子是春秋时期鲁国公室宗亲孟孙氏的后人。孟孙氏即庆父，史又称仲孙氏。后世的许多研究者也都采纳了赵岐的说法。如《元和姓纂》：“鲁桓公子庆父之后 号曰孟轲 因以为氏。”明代陈镐《阙里志》：“出鲁公族孟孙庆父之后 世居于邹 故为邹人。”如果此说可信 那么孟子的祖上就是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鲁国贵族。春秋末期，鲁国的三家贵族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瓜分了鲁国公室 掌握了鲁国的政权。这三家贵族都是从奴隶主贵族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三家瓜分公室，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取得了鲁国的政权，开始步入封建制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家族的子弟逐步衰微，纷纷出居他国。孟孙氏家族的一支大概就迁到了邹国，定居下来。到了战国中期，这个家族中就出现了赫赫有名的孟子。

一、孟子生卒年考

在孟子的生平事迹中，生卒年代是最难考证清楚的问题，至今仍无确定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有关孟子生卒的资料极为缺乏，《孟子》中既没有确切的说明，史书中也没有记载。如《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只用了百三十余字简略地记述了孟子的籍贯、受业、游历和著述等方面的情况，而于生卒之年却只字未提。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孟子》注本，在《题辞》中也没有记述有关生卒的情况。到了唐宋时代开始有人对孟子的生卒年进行了推测，但也是语焉不详。如朱熹《孟子集注》说：“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时方百四十余年，而孟子已老。然则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这段话的主旨是对孟子所说的“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的话表示怀疑，并非专门考证孟子的生卒，因此说的极为简略。

宋代以后，由于孟子被推崇为圣人，《孟子》一书也成了国家设科取士的经典，所以研究《孟子》的著作越来越多，考证孟子生卒年的著作也出现了不少。由于缺乏直接而准确的资料，各家之说也大都为推测之词。尽管这些推测不太可靠，但对于研究孟子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前人考证孟子生卒的著作有数十家之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

1. 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寿八十四岁。

这是《孟氏谱》的说法。此谱的作者不详。宋时未见有人引用。元张翥作《孟母墓碑记》始引其说。因此《孟氏谱》可能是宋元时的作品。

《孟氏谱》把孟子的生卒年和岁数说得非常确定。但与历史年代不相符合。周朝只有两位定王，一是春秋时的周定王瑜（公元前606年—公元前586年）；一是战国时的周贞定王介（公元前468年—公元前441年）。孟子生当战国，《孟氏谱》的定王只能是周贞定王。但贞定王在位止于二十八年没有三十七年。此说显然与历史记载不符。我们假定《孟氏谱》的记述有误。姑且认为定王三十七年是二十七年之误，那么孟子生年当是公元前442年。从此年下推到孟子卒年即赧王二十六年当公元前289年，共一百五十四年。说孟子活了一百五十四岁显然是不可能的，同时又与寿八十四之说自相矛盾。

既然《孟氏谱》记载的孟子生年极不可靠，那么它记载的孟子卒年和岁数也不一定可靠。但是后人却根据《孟氏谱》的卒年和岁数又推衍出一些新的说法。

2. 生于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卒于赧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或十三年（公元前302年）。

持此说者，如明陈镐《阙里志》：“孟子生在安王十七年。”清周广业《孟子四考》：“旧谱生年，当改定字去三字，为安王十七年，则上距孔子卒九十五年，其卒当在赧王十三年或十二年，而《谱》倒为二十，又衍六字也。”

此说很显然是根据《孟氏谱》演化出来的。人们看到了《孟氏谱》的错误，并想办法加以纠正，于是就把定王说成安王，安与定字形近而讹；又说三十七年的三字是王字之误，遂定孟子生年为安王十七年。又根据《孟氏谱》年八十四之说而定孟子卒年为赧王十二年或十三年。此说在《孟氏谱》的基础上把孟子的生年下移四、五十年，卒年上移十余年，并非毫无根据，考定者们可能对孟子活动的年代和战国史实进行了一番考察，因而结论是比较接近于正确的。

3. 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

如元程復心《孟子年谱》：“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鲁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十，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鲁文公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周正建子 改朔不改月也。寿八十四岁。”又清陈宝泉《孟子时事考徵》：“盖自赧王二十六年，遥溯烈王四年，适八十有四。况此年距孔子生一百八十年，距孔子卒一百八年，与孟子自云由孔子而来百有余岁亦合。”

此说的根据陈宝泉讲得很清楚 即根据《孟氏谱》的卒年和岁数上推八十四年，恰好是周烈王四年。此说的全部根据是《孟氏谱》，《孟氏谱》既不可靠 那么此说也未必可靠。但因此说的年代比较确定，而且从孟子游历诸侯的事迹考察，活动年代相去也不甚远，所以后人多采用此说。

前人关于孟子生卒年的考证，主要是以上三种说法，此外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皆大同小异，兹不具述。以上三说中，第一

种说法从总体上看显然是荒谬的，但这一说法的两个结论即孟子卒于赧王二十六年说和寿八十四岁说却被后世研究者所承袭。尤其是寿八十四岁说影响更大，甚至民间的某些传说也与此有关。例如民间流传的所谓“七十三、八十四是人年寿的坎儿”之说，就是根据孔子和孟子两位圣人的岁数分别是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而来。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史有明确记载。孟子的八十四岁从何而来却不得而知。这样一种没有根据的说法，人们为什么还要采用呢？这是因为从孟子的生平事迹和战国史实看，这一说法与孟子的活动年代大体相近。《孟子》书中虽然没有关于生卒年的明确说明，但有些记载还是能够反映出孟子活动年代的。请看下面这一段：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于吾国乎？”《孟子·梁惠王上》（以下只引篇名）

赵岐《孟子章句》：“叟，长老之称也。犹父也。孟子去齐，老而之魏，故王尊礼之曰父。”《史记集解》引刘熙《孟子注》：“叟，长老之称，依皓首之言。”“叟”是对老年人的尊称。梁惠王称孟子曰叟，可见孟子见梁惠王时年岁已老。按照一般人的习惯看法，六十岁以后皆可称老，孟子此时老到什么程度呢？这要联系孟子以后的活动来分析。孟子至梁，是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左右）。崔述《孟子事实录》：“按杜预《左传后序》云：‘《竹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然则《史记》所称会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王矣。所称襄王之元年，即惠

王之后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败于襄陵，皆惠王时事，非襄王时事矣。……然则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后元十二年襄陵既败之后；则孟子与惠王之所云者，无一语不符矣。孟子与齐宣问答甚多，而与梁惠殊少，在梁亦无他事；则孟子居梁，盖不久也。然犹及见襄王而后去；则孟子之至梁，当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 辛丑壬寅两岁之中 于《年表》则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此说的论述颇为精当 是可信的。孟子到梁的第二年梁惠王卒，梁襄王即位。孟子与他话不投机，于是离开梁国来到齐国。此时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19年），孟子在齐国呆了八年之久，由于与齐宣王在伐燕等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最后辞官而去（详细考述见“孟子游历诸侯”节），孟子离开齐国时大概是七十余岁。清代宋翔凤《过庭录》对孟子去齐年岁有一段专论：“《公孙丑篇·孟子将朝王》章，言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盖在孟子去齐之前。当赧王三年，孟子年过七十，故云齿尊。《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则五六十虽在养老之列，而尚无此隆礼，安得以齿尊自居？若孟子生于烈王四年，至赧王三年仅六十一岁，不宜云尔矣。计孟子致为臣而归时，已合七十致事，故云致为臣。若曰不可更仕矣。他日王谓时子曰：吾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此亦养老优贤之义，不能更令孟子仕，但留其归也。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曲礼》：七十赐几杖。孟子对客隐几，正是年过七十之证。”宋氏依据的《孟子》材料有这样几段：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一以慢其二哉？

孟子致为臣而归。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以上均见《公孙丑下》）

这几段是记载孟子去齐时的重要材料。宋氏根据这几段材料，又援引《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和“七十赐几杖”之说，考证了孟子离开齐国时已年逾七十。尽管宋氏仅据《礼记·曲礼》为说，理由显得并不很充分，但从孟子由梁至齐的数年间的行事看，结论大体不错。孟子在梁时已被尊称为“叟”，如果把“叟”字看做七十余岁，那么孟子在齐国的主要活动是在八十岁左右。以年近八旬的老人仍然四处奔波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似乎不太合乎情理。因此，较为通达的结论是，孟子六十余岁至梁，旋即至齐呆了八年左右，七十余岁“致为臣而归”。孟子去齐之后，回到家乡，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赵岐也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问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孟子章句》）孟子归隐后从事的这些学术活动也相当繁复，绝不是一两年能够完成的。所以说孟子七十余岁自齐返庐，至八十余岁而卒，与事实没有很大的出入。正因为如此，《孟氏谱》的寿八十四之说才普遍被人们接受。

孟子的年寿是八十余岁大致可以确定，那么他的生卒究竟是哪年呢？孟子见梁惠王是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是年孟子六十余岁。由此上推六十年是公元前380年，则孟子生

年当在此年或稍前一些。从梁惠王后元十五年下推二十年是公元前300年，孟子卒年当在此年或稍前。前引第二种说法把孟子生年定于周安王十七年，卒年定于周赧王十二、三年，即公元前385年至公元前303或302年，与我们的推测相近，是较为可信的一种说法。但这一说法把孟子生卒年说得十分确定，则是不可取的。就目前可以考见的材料看，只能对孟子生卒进行大致的推测，不可能指出其确切的年代。这并不是说不能把孟子生卒考证得更加接近于事实，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得出十分确凿的结论，反而是不足信的。

二、少年受教与私淑学儒

孟子的父亲名激，字公宜，在孟子幼年时就去世了，因此在历史上没留下多少痕迹。孟子的少年时代是与母亲一起度过的。

孟母仇(zhǎng 掌)氏，生平事迹不可详考。相传她是一位极有见识又很会教育子女的人。孟子失去父爱之后，母亲就成了他第任启蒙教师。在《列女传》、《韩诗外传》等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孟母教子的传说，其中“孟母三迁”、“杀豚不欺子”、“断织劝学”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成为后世教育子女的典范。孟母也成了优秀母亲的楷模。

“三迁”说的是孟母择邻教子的故事。“择邻”就是选择良好的客观环境，为孟子的学习创造条件。《列女传·母仪篇》载：

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乃去，

舍市旁。其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

孤儿寡母，搬一次家绝非易事，但孟母竟然接连三次搬迁，可谓爱子心切。一个人学习的好坏主要依靠主观因素，但也不可忽视客观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少年儿童来说，客观环境的好坏往往能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正处于成长发育时期，具有可塑性，又充满了好奇心，人们的一言一行和其他客观事物都会成为他们学习的对象。所谓“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在少年儿童身上表现得最明显。孟母是深谙这个道理的，所以她不怕其烦地搬家，终于选择了适宜少年孟子学习的良好环境。

孟母三迁的作法，对孟子的影响极为深刻，直到他成为儒学大师之后，仍然十分强调客观环境的重要作用。请看他在宋国与宋大夫戴不胜的一段对话：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 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挹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挹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滕文公下》）

这里 孟子讲了一个“楚人学齐语”的故事。故事的主旨是告诉戴

不胜，要想在宋国实行仁政，必须在宋王周围安排大量的支持者，造成有利于实行仁政的客观环境。从这个生动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孟母三迁的影响一直深深地铭刻在孟子心中。

孟母不仅重视客观环境对少年孟子的影响，而且十分注重言传身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启发引导孟子。“杀豚不欺子”的故事，说的就是孟母以自己的言行对孟子施以诚实不欺的品德教育。《韩诗外传》载：

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少年孟子看到邻居杀猪，好奇地提出疑问，孟母就脱口而出开了一句玩笑。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孟母却很后悔。她认为对稍有一点认识能力的孩子开这种说假话的玩笑是不适宜的。她

一贯教育孟子要诚实正直，并且言传身教从不含糊，因此不能因为一句不恰当的玩笑使以往的教育付之东流，于是真的买了东家的猪肉给孟子吃了。孟母的作法不见得可取，但通过此事却足以见孟母教育孟子的一片苦心。

“断织劝学”说的是孟母鼓励孟子刻苦读书的故事。《列女传》说：

（轲）稍长就学而归，母方绩，问曰：“学何所至矣。”对曰：“自若也。”母以刀断织。轲惧，问其故。母曰：“子之废学，

若我断其织矣。君子学以立名，问以广其知，是以居以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食哉？”轲惧，旦夕勤学不息。

孟子开始读书时并不十分用功，孟母既生气又伤心，为了教育孟子就割断了自己辛辛苦苦织成的布，并以此为喻告诫孟子废学有如断织。母子俩本以织布维持生计，因此断织之事对孟子震动很大，从此后他就起早贪黑刻苦攻读了。

以上三个故事，大概是作者根据某些流传的材料编著而成。尽管不能当作信史实录看待，但也绝非完全出于杜撰，对于研究孟子生平事迹特别是青少年时代的事迹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孟子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度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少年时代，并为此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家住在读书人聚集的学宫附近，能经常受到礼仪风习的熏陶，孟母又经常用仁义道德等思想启发孟子，所以孟子在学习中自然地对孔子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稍长之后就拜师求学，研习儒家学说，并立志毕生从事宣传儒家思想的事业。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遂成一代名儒，然而他的老师却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按说能教育出孟子这样杰出人才的老师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一些痕迹，但孟子却不愿透露他的姓名。在谈到师承关系时，孟子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这句富有神秘色彩的话引起了古今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从汉代开始就不断地有人考证孟子所私淑者。

最早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司马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

“孟轲 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认为孟子的老师是子思的学生。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的孙子，战国初期大名鼎鼎的思想家。可惜他的学生没留下姓名。司马迁大概是根据孟子“私淑诸人”之意，又考察了子思与孟子思想体系的关系而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子思和孟子的思想是脉相承的，属于同一体系，史称思孟学派。早在战国时人们就把子思和孟子的学说视为一体了。如《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 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瞽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这段话是对思孟学派的批评 列举了子思和孟子思想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孟子的学说的确是源于子思，而司马迁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是有根据的。

但是汉代的一些学者并不完全同意司马迁的意见。他们认为孟子的老师应该就是子思而不是什么“门人”。这大概是出于推崇孟子的缘故，认为像孟子这样卓越的学者，总要出于名师之下才能相配 于是就把孟子的老师定为子思。如刘向《列女传》：“孟子旦夕勤学不息 师事子思 遂成天下之名儒。”班固《汉书·艺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 名轲 邹人 子思弟子。”赵岐《孟子题辞》：“长师孔子之孙子思 治儒术之道 通五经 尤长于《诗》《书》。”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孟子受业于子思。”东汉王肃编的《孔丛子》中甚至还记载了孟子和子思的对话。例如《杂训篇》：“孟轲问牧民何先 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义而已矣 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

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晋代的王劭为了证明子思是孟子的老师 甚至怀疑《史记》“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的“人”字是衍字 以为去掉“人”字就可以弥合汉人说法的矛盾，统一观点。

以上所引诸说，都十分肯定地确认孟子亲受业于子思，但稍作考察即知此说与历史年代不符。据《史记》，子思六十二岁死。孔子卒于公元前 479 年，孔子之子伯鱼即子思的父亲比孔子早死了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 482 年。而子思的生年最晚也不会晚于伯鱼的卒年。从伯鱼的卒年下推六十二年当是公元前 420 年，子思的卒年无论如何也不会晚于此年。而此时孟子尚未出生，怎么可能直接受业于子思呢？至于《孔丛子》编造的孟子与子思对话云云，更是天方夜谭了。再说孟子的老师如果真是声名显赫的子思，他一定会堂而皇之地向别人公开宣布，用不着遮遮掩掩地说什么“私淑诸人”的话了。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但是刘向等人的观点也不可全盘否定。从细微处看，孟子的老师不可能是子思，这有历史年代作证。但从总体上看，孟子思想的确是源于子思，是子思学派的门人。刘向等人把孟子置于子思门下并没有错，只是因为时代久远，孟子又没有明确地在别人面前称述其师，所以只好根据学术思想的考察来确定孟子的老师，得出了大体上正确、细微处错误的结论。总之，汉代关于孟子师承关系的考证还是司马迁说的较为正确。

但是后人并不满足于司马迁的结论，认为司马迁之说未能全面概括孟子的师承渊源。因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按照司马迁的师承授受应该是：

孔子——子思——子思门人——孟子

而子思不可能直接受业于孔子，在孔子和子思之间应该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这个人是谁呢？近代学者康有为、梁启超、郭沫若等都认定这个人是子游。子游是孔子的入室弟子，“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子游氏之儒亦是其中一派。康有为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孟子微·序》）梁启超说：“春秋太平世之义，传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可见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以受于孔子也。此派为荀派所夺，至秦而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郭沫若说：“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孟氏自然就是孟轲，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乐正氏当即孟子弟子的乐正克。但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十批判书》）诸说所根据的材料是前引《荀子·非十二子》中的一段，其中一句话是：“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以这段话为根据来说明子思孟子之学出于子游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从荀子对于孔子、子弓和子游的不同态度上可以看出康氏等人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

在荀子的文章中，对孔子总是持推崇和表扬的态度。同时，荀子对孔子的弟子子弓也总是持推崇和表扬的态度，并且经常把孔子和子弓的名字连在一起加以赞颂。例如《非十二子》篇说：“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执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又说：“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人之迹著矣。”对孔子子弓推崇如此，无怪乎韩愈说：

“荀卿之书 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引见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 后人根据荀子的态度而认为荀子之学出于子弓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荀子对于子游却是一贯批判的态度。请看这段：“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 必曰君子固不用力 是子游氏之贱儒也。”《非十二子》篇 这显然是对子游氏及其后学的批判态度。荀子既然对孔子和子游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评价，那就绝不会把孔子和子游的名字连在一起加以推崇和褒扬。但是，在康氏、梁氏等引为根据的那段文字中，荀子不仅把孔子和子游的名字连在一起，而且很显然是褒扬和推崇的态度。这就与荀子本来的思想逻辑发生了矛盾。因此 前人在注释《非十二子》篇时 就曾经对“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一句的文字表示过怀疑。如清人郭嵩焘说：“荀子屡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云子游氏之贱儒，与子张子夏同讥 则此子游必子弓之误。”（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引 我认为郭嵩焘的话很有道理，这段话中的子游当是子弓之误。如果子游不换成子弓，那么荀子这一篇中的思想无论如何也无法统一，他不可能在同一篇文章中对同一个人采取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如果子游确是子弓之误，那么荀子思想统一了，而康氏、梁氏等则失去了立论的根据。总之，用这样一段文字上有疑点的话来确定思孟学派的师承关系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还有人认为孔子与子思之间的承传者是曾子。曾子名参，是孔子的高足之一。持这种意见的人有唐代韩愈、宋代程颐等。韩愈说：“孟轲师子思 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韩愈集·送王秀才序》）程颐说：“……颜子歿后 终得圣人之道者 曾子也。观其启手足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见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序说》）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呢 从《孟子》